

汉代乐钟编列制度初考

张闻捷(厦门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DOI:10.13619/j.cnki.cn11-1532/k.2018.03.002

西汉初年,承暴秦焚书之弊,礼乐荒废,而乐制尤甚^[1]。虽有叔孙通、贾谊等人奏具礼仪,汉武帝时更尚儒学、进贤良,制定汉家制度,但《乐经》既亡,乐制又由制氏专门掌管,所以汉世诸儒多仅能盛言乐义,而已不知钟磬的音律、铸造、编列悬置等具体乐器制度^[2]。后世学者虽尝试梳理历史上有关乐钟悬挂方式的各种主张^[3],却仅能追溯至东汉经学家郑玄著名的“二八”之说^[4],而不能通晓两汉时期乐钟的实际使用情况。幸而近来考古工作发现了一批隶属于汉代的编钟资料,使我们不仅可以认识汉代乐钟的独特形制^[5],亦能有机会初步地探讨汉代乐钟的编列制度,进而与文献及先秦乐制相比较,来帮助了解先秦乐制的传承情况及亡佚过程。

一 汉代乐钟的编列制度

两汉之世,青铜礼乐器的使用已趋衰落,完整的出土编钟资料自不可与先秦时期“同日而语”,但是从这些散见的乐钟组合来看,已经可以展现出汉代乐器制度的多样性面貌。

1. “5甬14纽”组合编钟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西汉皇室内部使用着相对一致的乐钟组合。山东章丘洛庄汉

墓,为吕后时期诸侯王级墓葬,约葬于公元前186年,其14号乐器坑内出土一套完整编钟,包括甬钟5件,纽钟14件,形制相若,尺寸递减,上纽下甬悬挂于单架双龕钟虞之上,另搭配石质编磬20件,分左、右两组各10件悬于单层磬架之上^[6]。江苏大云山一号汉墓,为汉武帝时期江都王刘非之墓,葬于公元前127年,其墓室西回廊出土一套实用编钟,包括甬钟5件,纽钟14件,形制相若,尺寸递减,上纽下甬悬挂于单架双龕钟虞之上(图一),并搭配铅钹玻璃制编磬21件^[7]。另在墓室东回廊又出土众多小型明器编钟,发掘简报推测亦为三套“5甬14纽”组合,但近来公布的测音报告认为是“两组纽钟,分别为22件与20件,以及甬钟一组16件”^[8],故其可能遵循不同的编列制度。广州象岗南越王墓,为汉武帝前期南越王赵昧之墓,约葬于公元前122年,其墓室东耳室内出土一套编钟,包括甬钟5件,纽钟14件,纽钟尺寸递减排列于北墙壁下,横龕尚存,未见立虞,甬钟尺寸递增排列于纽钟东侧,未见钟虞,另搭配石质编磬18件^[9]。

以上三座墓葬所出实用编钟的形制、数量及组合、悬列方式基本相同,音列亦为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七声构成的正声音阶,故

被认为是西汉前期皇室的用乐规范,从音列与音阶来看,都是对先秦礼乐制度的继承^[10]。

2. “4甬9纽”组合编钟

在已发现的较低等级汉墓中,编钟组合又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西安北郊红庙坡汉墓,年代为西汉早期,墓内出土一套陶质明器编钟,包括甬钟4件,纽钟9件,上纽下甬悬挂于单架双翼、有翼兽木质附座的钟虬之上,另搭配陶质编磬一套9件。其钟体内壁仍留有调音之用的楔形音脊,应为模仿实用编钟所制^[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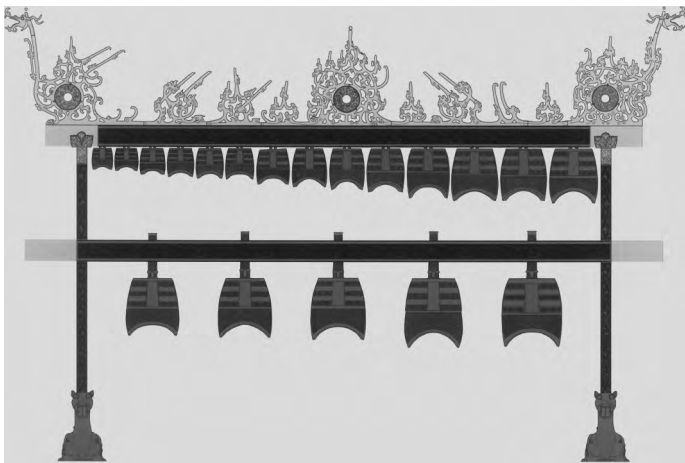
山东临淄稷山一号汉墓,年代为西汉早期,曾被盗扰,后追回一套陶质鎏金明器编钟,包括甬钟4件,纽钟9件(图二),但钟虬结构及编磬数量不明^[12]。以上两套明器编钟均采用“4甬9纽”的组合,所依据的应为同一编列制度。

此外,江苏仪征张集团山汉墓 M1,年代为汉武帝时期,无盗扰,乐器皆置于头箱与边箱内,包括一套陶质明器编钟,由纽钟9件组成,形制相若,尺寸递减,另搭配陶质编磬一套12件^[13]。该墓仅用“9纽”组合而未见甬钟,或许表明墓主身份爵秩又低一等。

安徽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夫妇墓 M1,年代为汉文帝时期,出土一套陶质明器编钟,发掘简报称包括铸钟5件,纽钟9件,并搭配陶质编磬一套20件,叠置于 M1 内东南角。简报附表又称“(铸钟)甬(部)柱形,有钩”,而实际上,直悬的铸钟并不会使用柱形纽并带侧钩,另从平面图上看,钟于呈弧形^[14],这些特征都说明铸钟实为甬钟,且汉墓迄今未见出土铸钟,所以该墓实际采用了“5甬9纽”的组合,或可视为上述“5甬14纽”与“4甬9纽”两种编列制度的混合形态。

3. “5甬10纽”组合编钟

西安范南村汉墓 M92,年代为西汉早期,出土一套完整的陶质明器编钟,包括甬钟5件,纽钟10件,上纽下甬悬挂于单架双翼、



图一 江苏大云山一号汉墓出土“5甬14纽”编钟复原图

有翼兽木质附座的钟虬之上,另搭配陶质编磬一套19件^[15]。

另有仅见“10纽”组合的编钟。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为西汉前期轲侯利苍子嗣之墓,出土一套木质明器编钟,由纽钟10件组成,尺寸递减,悬挂于单架单翼木质钟虬之上,另搭配木质编磬一套10件^[16]。陕西新安机砖厂汉墓,年代为西汉早期,列侯等级,出土陶质明器纽钟两组共10件,每组尺寸递减,置于头箱内^[17]。江苏徐州子房山汉墓 M2,年代为西汉早中期,出土铜质明器纽钟10件,形制、尺寸相若(图三)^[18]。东汉卫宏在《汉旧仪》中曾提及“高庙撞千石之钟十枚”^[19],亦即《上林赋》所言“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虬”^[20],或许正与这“10纽”一组的编列制度有关。

4. 其他组合编钟

除以上编列情况外,考古资料中还散见一些特殊情况,由于数量有限或存在盗扰,尚不能判断其是否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组合形式。江西南昌海昏侯汉墓,年代为汉宣帝时期,出土甬钟10件,纽钟14件,分别悬挂于单架单翼、有翼兽铜质附座的钟虬之上^[21]。从业已展出的7件甬钟来看,其纹饰、尺寸差异较大,包含三种不同的类型,因此推测其是丧葬时用三套甬钟拼凑而成,而非同时铸造^[22]。至于此种做法是否有制度可循,还需有新的材料佐证^[23]。四川绵



图二
山东临淄稷山一号汉墓
出土“4 甬 9 纽”编钟

阳双包山汉墓 M1, 年代为西汉中晚期, 出土陶质明器纽钟 7 件, 搭配编磬 2 件, 因有盗扰, 原始情况不明^[24]。至于云南江川李家山汉墓 M51, 出土纽钟 6 件, 其环纽椭圆腹形制以及云南、广西一带盛行的羊角纽编钟形制, 均与汉式编钟分属不同的礼仪系统, 数量上也缺乏明显的规律^[25], 故在此不作讨论。

东汉之后, 编钟使用衰落严重, 至今尚未见到属于这一时期的完整编钟出土。虽然在一些画像石材料中见到有悬挂编钟、编磬的例证, 但几乎均只有 1 或 2 件悬于钟虡之上^[26],

无法探知其完整情况。文献中, 在记载东汉皇帝大丧用器的《续汉书·礼仪志》里有如下记述: 天子随葬“钟十六, 无虞。铸四, 无虞。磬十六, 无虞”^[27], 这与《周礼》郑注之说颇有相近之处, 但显然与西汉乐钟编列完全不同, 恐另有所本。

综上所述, 西汉时期的乐钟编列至少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组合形式, 虽然其质地多有陶、木之属, 但须知这些明器皆是在丧葬活动中有意制作的, 且形制规整、组合严谨, 并非是随意拼凑而成, 更能表明其所遵循的是并不相同的



图三 江苏徐州子房山汉墓 M2 出土“10 纽”明器编钟

乐器制度。而江都王刘非墓中所出明器编钟,采用了与实用编钟完全不同的组合形式,同样表明,即使在西汉王室内部,也存在着多样的乐钟编列规范可供选择。

这一结论又可以从编磬的使用上得到印证:洛庄汉墓乐器坑内与编钟搭配的编磬为20件,大云山汉墓中实用编磬为21件,而南越王墓共出土编磬18件,西安北郊红庙坡汉墓与编钟搭配的陶质编磬是9件,仪征张集团山汉墓则是12件,但临淄稷山汉墓的编钟又未有编磬搭配。由此可见,汉代编磬的使用也是十分多样和随意的,并不存在高度统一的规范。

二 汉代乐钟编列制度溯源

战国以来,群雄割据,礼乐制度陷入了分裂多样的局面。汉廷龙兴,百废待举,在国家各项典章制度上多只能模仿、沿用先秦以来的旧有传统,乐制建设亦不例外。而由于各地存在着不同的古乐版本,所以汉人在仿造的过程中,也自然出现了上述不同的乐钟编列方式。另从已发表的汉代编钟测音报告看^[28],虽然当时存在统一的设计音高,但在调音技术上却已无法企及先秦乐匠,出现了铸调不精导致的大量音高偏差现象,正、侧鼓音之间也多缺乏清晰的音程关系,甚至有通过后焊补方式来弥补音准的情况^[29]。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汉代乐钟制度的继承性而非创造性。下文将进一步梳理先秦时期乐钟编列情况,以追溯汉代乐钟编列制度的渊源。

1. “5 甬 14 纽”组合的渊源

已有学者指出,汉代铸钟消失之后,甬钟无论在组合还是乐律上,均主要充当的是先秦铸钟节音的作用^[30],所以其音高通常较低,且数量多为5件一组,这正是春秋晚期以来铸钟的器用制度,而甬钟自春秋时期起基本为8~16件一组,5件成编的情况几乎不见。铸钟5件一组的实例如山西太原赵卿墓,年代为春秋战国之际,出土铸钟共19件,分为夔龙纹5件和散虺纹14件^[31]。河南汲县山彪镇一号墓,年代为战国初期,出土铸钟共14件,分作两型并

分开陈设,较大者5件成列位于墓室西南角,较小者9件成列位于墓室东南侧^[32]。此外还有山东阳信西北村春秋晚期墓M1(5铸9纽)(图四)、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早期墓(5铸7纽)、安徽凤阳卞庄春秋晚期一号墓(5铸9纽)、江苏六合程桥春秋晚期墓M2(5铸7甬)、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晚期墓(5铸7纽)等皆为5件铸钟成组^[33],这正是春秋早中期4件铸钟编列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战国中期以后,各地持续出现以大型甬钟来取代铸钟的做法,如河南陕县后川战国中期墓M2040中,出土铸钟9件、大甬钟4件,小甬钟16件以及纽钟9件,其中4件大甬钟尺寸远大于其他编钟,正是参照传统的铸钟来制作的(图五)^[34];近似现象亦见于江苏邳州九女墩战国初期三号墓,出土铸钟6件、甬钟4件、纽钟9件,其中甬钟的体形也最为巨大^[35]。所以,汉人“以甬代铸”的做法显然是延续了战国中晚期以来的用乐趋势。

战国中期以后,14件纽钟成组单独出现的情况同样十分盛行,如山东临淄商王村战国晚期墓M2、河北平山战国中期晚段中山王𦉑墓、四川涪陵小田溪战国中晚期墓(图六)、传世战国中晚期虬羌钟等均只有14件纽钟出土,而无甬钟、铸钟搭配,无疑是这一时期新兴的乐器制度^[36]。

由此可以推测,汉代使用的“5甬14纽”组合形式正是在战国中后期新的乐器制度基础上融合改造而成,是对战国礼制的传承和延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楚地的铸钟多以8件成组^[37],而5件铸钟成组的做法主要盛行于中原、山东及东方的吴国(受晋制影响),是以表明,在宫廷乐制系统上,西汉皇室更可能舍楚制而取北方“诸夏”礼制。

2. “4 甬 9 纽”组合的渊源

目前已发现的春秋中晚期编钟里采用4件铸钟或“4铸9纽”组合的实例有河南新郑礼乐祭祀坑K1、K4、K5、K7、K8、K9、K14、K16、K17,春秋中期,每坑均出土铸钟4件,纽钟20件并分为两组各10件,三者分上、中、下三层悬于一架钟虡之上^[38]。相同的配置还见于新郑金城路

祭祀坑与城市信用社祭祀坑中^[39]。而山西侯马上马村春秋晚期墓 M5218、山西临猗程村春秋晚期墓 M2、山东滕州庄里西村春秋晚期墓则均出土一套编钟,包括镈钟 4 件,纽钟 9 件,成列分布或叠置在墓内一角,未见钟虬(图七)^[40]。这种“4 镈 9 纽”的组合很可能是汉代相应乐钟编列的来源。

此外,春秋时期,以 9 件纽钟成组的例子也十分多见。例如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晚期墓 M1(6 镈 9 甬 9 纽),河南叶县旧县春秋中

期墓 M4(8 镈 20 甬 9 纽),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墓 M1(9 纽)(图八)、M10(8 镈 9 纽),淅川和尚岭战国初期墓 M2(8 镈 9 纽),淅川徐家岭战国初期墓 M3(8 镈 9 纽),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战国之际墓 M1(8 镈 9 纽),安徽凤阳卞庄春秋晚期墓 M1(5 镈 9 纽),山东临沂凤凰岭东周墓(9 镈 9 纽),山西闻喜上郭村春秋早期墓 M210(9 纽)、M211(9 纽),长治分水岭春秋晚期墓 M269(9 甬 9 纽)、M270(8 甬 9 纽)等^[41]。



图四 山东阳信西北村春秋晚期墓 M1 出土“5 镈 9 纽”编钟



图五 河南陕县后川战国中期墓 M2040 出土 4 件大甬钟



图六 四川涪陵小田溪战国中晚期墓出土“14 纽”编钟

从盛行年代上看,“4 铸 9 纽”以及一套 9 纽的组合均主要见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期之后铸钟与纽钟的数量均不断扩充,所以“4 甬 9 纽”的组合较之于“5 甬 14 纽”组合显然更为古老,故在汉代多为普通贵族所用,而皇室内部鲜见。

3. “5 甬 10 纽”组合的渊源

5 甬编列自不必再论,而 10 件纽钟成组的情况最早见于湖北枣阳郭家庙春秋早期墓

M30,仅出土纽钟 10 件,形制相若,尺寸递减,堆叠于椁底板上(图九)^[42]。此后上述河南新郑春秋中期礼乐祭祀坑出土纽钟亦为 10 件一组。战国中期以后,纽钟基本均为 10 件以上成组,如山东临淄淄河店战国中期墓 M2,出土明器铸钟 8 件,甬钟两组共 16 件以及纽钟 10 件,尺寸递减^[43]。说明这一编列方式确从春秋时代沿用到战国之后,并进而为部分汉代人所采纳。



图七 山东滕州庄里西村春秋晚期墓出土“4 铸 9 纽”编钟



图八 河南浙川下寺春秋晚期墓 M1 出土“9 纽”编钟



图九 湖北枣阳郭家庙春秋早期墓 M30 出土“10 纽”编钟

由此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新旧礼制不断更替,不同地区先后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器用制度,所以我们在乐器层面也见到了极为多样的组合形式,成为不同的乐制规范蓝本。汉代之后,虽然实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但礼乐制度的规范化显然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尤其是汉儒与乐器工匠对于先秦金石之乐掌握已远逊从前,所以在乐制上只能主要借鉴东周以来的“古乐”系统。而在《乐经》佚失、缺乏明确典章制度约束的前提下,不同的

汉代贵族自然会采纳各自有别的古乐版本,从而形成纷繁复杂的乐钟编列形态。

三 结 语

依据汉墓出土的乐钟资料可以推知,汉代编钟的使用并未遵循统一的制度规范,一套编钟至少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编列方式,即5甬14纽、4甬9纽、5甬10纽。虽然西汉皇室有统一乐制的努力,但中小贵族仍会沿用不同版本的乐钟组合规范。

这些多样的器用制度其实在东周时期皆有所本,说明汉世用乐存在不同的礼制渊源。是故汉初叔孙通肇制礼仪时,齐鲁诸儒皆“非之”^[44],正表明他们对古礼的理解存在差异。而通过与先秦时期乐钟资料的比较,又可以进一步发现,西汉皇室所采纳的“5 甬 14 纽”的制度规范是战国中期之后日趋盛行的新兴礼制系统,而较为古老的乐制版本则主要见于中小贵族及地方勋贵群体中。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乐钟的“乐悬制度”。《汉书·礼乐志》曾记载西汉宗庙祭祀时“高张四县,乐充宫廷”^[45],贾谊在《新书·审微》篇中亦提到“礼,天子之乐宫县,诸侯之乐轩县,大夫直县,士有琴瑟”^[46],证明汉儒仍是通晓周代以来的“乐悬制度”并将其付诸礼制实践的。但是,从上述所列汉代随葬编钟实例来看,却并未见到有多面折曲陈列的形制,这或许表明汉人对于随葬乐钟与宗庙礼乐有着不同的处理原则。

- [1] 《汉书·艺文志》载,“周衰俱坏,乐尤微眇……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第 1711、1712 页,中华书局,1975 年。当然乐制衰落不能全责于始皇焚书,实际从战国晚期开始青铜编钟使用便已大幅简化,墓葬中的明器编钟也急剧增多。
- [2] 《史记·乐书》载,“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第 1204 页,中华书局,1975 年。从中可以窥知汉儒对于乐器制度层面的理解和态度。
- [3] (宋)陈旸《乐书》卷一〇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三》,中华书局,2011 年;(清)江藩《乐悬考》,转引自曾永义《仪礼乐器考》,(台北)中华书局,1986 年;(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第 1827~1831 页,中华书局,2008 年。
- [4] 《周礼·春官·小胥》载:“凡悬钟磬,半为堵,全为肆。”郑注:“钟磬者,编悬之,二八十六枚在一虞,谓之堵。钟一堵、磬一堵谓之肆。”(汉)郑玄注、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第 605、60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 [5] 关于汉代乐钟的特殊形制,学界已多有讨论,参见王清雷《章丘洛庄编钟刍议》,《文物》2005 年第 1 期;方建军、郑中《洛庄汉墓 14 号陪葬坑编钟研究》,《音乐研究》2007 年第 2 期;王子初《海昏侯时代的编钟——它们见证了“礼乐”的复古与没落》,《中国国家地理》2016 年第 3 期。
- [6]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 年第 8 期;王子初《洛庄汉墓出土乐器述略》,《中国历史文物》2002 年第 4 期;方建军、郑中《洛庄汉墓 14 号陪葬坑编钟研究》,《音乐研究》2007 年第 2 期;王清雷《章丘洛庄编钟刍议》,《文物》2005 年第 1 期。洛庄汉墓乐器坑共出土编磬六套 107 件,与编钟搭配的为一套 20 件,参见方建军、郑中《洛庄汉墓 14 号陪葬坑编钟、编磬测音报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 年第 3 期;方建军、郑中《洛庄汉墓 14 号陪葬坑编磬的组合、编次和音阶》,《中国音乐学》2007 年第 4 期。
- [7]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2013 年第 10 期。
- [8] 大云山汉墓出土的 22 件一组纽钟均没有音梁,而 20 件一组纽钟均有音梁,可见是有意区分的两组。“16 甬 22 纽 20 纽”的编列形式在两周时期都是有其先例的,故对其具体编列方式的判断宜等正式发掘报告公布后再作定夺,参见冯卓惠《大云山汉墓编钟的测音分析与研究》,《中国音乐》2016 年第 1 期。
- [9]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第 39、40 页,文物出版社,1991 年;孔艺龙、刘成基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广东卷》,第 282、292 页,大象出版社,2010 年。
- [10] 王子初《海昏侯时代的编钟——它们见证了“礼乐”的复古与没落》,《中国国家地理》2016 年第 3 期;冯卓惠《大云山汉墓编钟的测音分析与研究》,《中国音乐》2016 年第 1 期。
- [11] 方建军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第 98 页,大象出版社,1996 年。
- [12] 其中 9 件纽钟有 1 件缺失。参见周昌富、温增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第 75、112 页,大象出版社,2001 年。
- [13] 南京博物院等《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92 年第 4 期;王子初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江苏卷》,第 202 页,大象出版社,1996 年。
- [14]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 8 期。
- [15] 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龙首原汉墓(甲编)》,第 118、119 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 年;同[11],第 114、115 页。

- [16]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
- [17] 郑洪春《陕西新安机砖厂汉初积炭墓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
- [18]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子房山西汉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年。
- [19] 《汉旧仪》一书已佚，此记载见于《旧唐书·音乐志二》，第1079、1080页，中华书局，1975年。又《三辅黄图》载：“高祖庙钟十枚，各受十石，撞之声闻百里。”参见陈直《三辅黄图校证》，第6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 [20]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3038页，中华书局，1975年。
- [21] 王子初《海昏侯时代的编钟——它们见证了“礼乐”的复古与没落》，《中国国家地理》2016年第3期。
- [22]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
- [23] 湖北荆州天星观战国中期二号墓与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中晚期墓M16均出土铸钟10件，或可视为海昏侯墓甬钟10件之滥觞，参见荆州市博物馆《湖北省荆州市天星观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9期；河北省文物局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第十六号墓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
- [2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绵阳双包山汉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严福昌、肖宗弟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第38、39页，大象出版社，1996年。
- [25] 黄德荣《云南羊角编钟初探》，《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
- [26] 李荣有《汉画钟鼓之乐与礼乐文化考论》，《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12年第2期。
- [27] 《后汉书·礼仪志》取自西晋司马彪《续汉书》，司马彪去东汉之世未远，所以其说法当具有一定代表性。
- [28] 包括洛庄汉墓、大云山汉墓、南越王墓。
- [29] 大云山汉墓编钟的测音结果呈现出较为无序的状况，其中7号纽钟的内壁，采用了罕见的焊补调音方式以增加钟体厚度（一般是用锉磨或凿刻法），说明其在铸造时便产生了设计上的纰漏而被迫采用此法弥补，参见冯卓惠《大云山汉墓编钟的测音分析与研究》，《中国音乐》2016年第1期。
- [30] 方建军在《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编钟研究》一文中提到“这5件大型的甬钟，其功能似乎更像大型的编钟一样，属于只使用正鼓音的单音编钟”，《音乐研究》2007年第2期。
- [31] 王子初《太原晋国赵卿墓铜编钟和石编磬研究》，《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 [32] 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第46、47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关于汲县山彪镇一号墓的年代及国别历来争议较大，高明考证为魏国大将魏襄子，参见高明《略论汲县山彪镇一号墓的年代》，《考古》1962年第4期；陈昭容对诸家意见有较好的梳理，参见陈昭容《论山彪镇一号墓的年代及国别》，《中原文物》2008年第3期。
- [33] 周昌富、温增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第54、95页，第57、109页，大象出版社，2001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凤阳卞庄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8期；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考古》1965年第3期；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4合期。
-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东周秦汉墓》，第67~70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 [35] 孔令远、陈永清《江苏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5期。
- [36] 淄博市博物馆等《临淄商王墓地》，齐鲁书社，199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罍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第111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涪陵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唐兰《虬羌钟考释》，《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 [37] 邵晓洁《楚钟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
- [3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祭祀遗址》，大象出版社，2006年。
- [39] 赵世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第94、97、112、114页，大象出版社，1996年。
- [40] 其中上马村墓M5218实际出土4件大铸钟和9件小铸钟，小铸钟实为参照纽钟所制，这种“以铸代纽”的现象在春秋晚期晋国贵族墓葬中十分普遍，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马墓地》，第192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赵慧民等《山西临猗县程村两座东周墓》，《考古》1991年第11期；周昌富、温增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第46、95页，大象出版社，2001年。
- [4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9期；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等《河南叶县旧县四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9期；河南省文物

研究所等《浙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凤阳卞庄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8期；山东省兖石铁路文物考古工作队《临沂凤凰岭东周墓》，齐鲁书社，198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76年闻喜上郭村周代墓葬清理记》，《三晋考古》（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

- [42] 方勤《郭家庙曾国墓地发掘与音乐考古》，《音乐研究》2016年第5期；张翔《郭家庙M30出土的编钟》，《音乐研究》2016年第5期。
- [43]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齐墓》，第322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 [44] 《汉书·礼乐志》载“叔孙通将制定礼仪，见非于齐鲁之士”，第1034页，中华书局，1975年。
- [45] 同[44]，第1046页。
- [46] （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第74页，中华书局，2000年。

（责任编辑：耿 昀）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the System of the Arrangement of the Chimed Musical Bells in the Han Dynasty

Zhang Wenjie

During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uses of the bronze ritual vessels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were continuing to decline. The complete sets of chimed musical bell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unearthed to date cannot be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pre-Qin period, and, furthermore, no cases of complete set of chimed musical bell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have been found to date. In spite of this, the studies revealed that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chimed musical bells still had at least three kinds of assemblages, including “five *yong*-bells and fourteen *niu*-bells”, “four *yong*-bells and nine *niu*-bells” and “five *yong*-bells and ten *niu*-bells”, and they could all find origins in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which were the traditions of “five *bo*-bells”, “fourteen *niu*-bells”, “four *bo*-bells and nine *niu*-bells”, “ten *niu*-bells” and so on. Among them, the assemblage of “five *yong*-bells and fourteen *niu*-bells” used by the imperial court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as an innovative ritual system getting popular since the mid Warring-States Period, and the older musical instrument setting systems were mainly seen among the medium- and lower-ranking elite classes and local noble people.

文物

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12~2014年发掘简报

马家塬墓地位于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木河乡桃园村村北的马家塬上。2012~2014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联合,对墓地进行了连续发掘,清理墓葬13座、祭祀坑1座。墓葬分为竖穴阶梯墓道偏洞室墓、竖穴墓道偏洞室墓、竖穴墓道洞室墓、竖穴土坑墓。墓中出土了陶器、铜器、铁器、石器及车辆等。墓葬内普遍殉牲,将车体构件拆分后随葬或仅随葬车体饰件以代替构件乃至整车的现象比较常见。结合墓地以往的发掘推断,墓地经过了统一规划,墓区存在阶段性或分区域整体祭祀活动。本次发掘的小型墓为进一步探讨墓葬的族属特征、当时的秦戎关系等提供了新材料。

汉代乐钟编列制度初考

两汉之世,青铜礼乐器的使用渐趋衰落。西汉出土的完整编钟资料已不可与先秦时期“同日而语”,东汉时期更未有完整编钟出土。尽管如此,通过研究发现,西汉时期编钟至少有三种以上组合情况,包括“5甬14组”“4甬9组”“5甬10组”及其他,且这些编列制度在东周时期皆有所本,可能分别源自“5甬”“14组”“4甬9组”“10组”的传统。其中西汉皇室所采用的“5甬14组”制度是战国中期之后日趋盛行的新兴礼制系统,而较为古老的乐制版本则主要见于中小贵族及地方勋贵群体中。

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简牍概述

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发现于2006年,出土简牍2000余枚,全部存放在竹筒中。内容包括质日、官府文书、私人簿籍与律典、算术、书籍、日书等。质日简册大致包含汉文帝十年到后元七年的各年质日,除记各月大小和各日干支外,还记载有时令和墓主人的日常公务。律典、算术类可与张家山汉简对照,书籍类多见于《说苑》《新序》《韩非子》《列女传》等传世文献。这批简牍资料的发现,对于研究西汉时期的历法、法律、基层官吏的日常公务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